引 子

从 50 年前说起

我与胡风共同生活了 50 多年。这 50 多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但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却是漫长、艰辛的历程。现在，要在短时间内全部回忆起来是十分困难的。我只得先将那鲜为人知的 1955 年～1979 年间的情况尽量详尽地写出来，这便是本书的主要三篇。至于这 25 年前后的情况，就暂且大略带过。完整的,翔实的《胡风传》将是我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1933 年上海的初夏，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左联盟员韩起家中见到了刚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谷非(胡风)。那时,我为了谋生，正在人家当家庭教师。由于几个同志被捕后派人来找我接济，暴露了我的身份，我被主人辞退了，回到了南市区父母家中。找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是想让他帮我调到法南区参加左联小组的活动，这样更方便些。

韩起向我介绍了谷非，并谈到了共同认识的钟潜九在苏州监狱的情况。谷非立即拿出 5元钱要我寄给钟，还说以后可以找几本英文书寄给他翻译。

后来,谷非负责左联宣传部,从此我就由他个人领导,常去他家。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增进了了解。不久，他向我表示了爱情。我们于同年 12 月结婚,次年 10 月生长子晓谷。从此，我不再参加左联的组织活动,而是在家看书习作,并在他的作家兼编辑的生涯中担任他的主要助手，照顾他的生活。

起先,他的公开职业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时事类编》日文编译员。这是主编兼中山文化教育馆负责人之一陈彬和约请的。而胡风是由韩起的朋友湖南人杨幸之的介绍，杨当时是陈的私人秘书,代陈写进步文章,很得陈的器重。后因穆木天从监狱出来后造谣说胡风是国民党派来的，而韩侍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又当人面说他拿国民党的钱又拿卢布，因此暴露了身份。他只得辞去这份职业，同时为了对组织负责也提出了辞去左联书记职务。从此,胡风被怀疑是国民党派来的,这个冤案的阴影一直就跟随在胡风的背后。但他不管这些，开始了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生涯。第一篇署名‘胡风’的文章《林语堂论》就是那时的作品。以后就一直沿用了这个以他母亲的姓为姓的笔名。

离开左联后,F(胡风，下同）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他经常代鲁迅先生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曾带我到鲁迅先生家中去做客。我们也曾请先生来家吃过一次饭。在先生急切想为亡友瞿秋白编文集时,我曾帮忙代抄瞿秋白有关翻译方面的文稿,尽了一点力。

1936年初夏,冯雪峰回到上海。和F一起谈论文艺界的情况时,雪峰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觉得不妥,要F另想一个。经商议,认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能符合当时的革命需要,并决定由F写篇文章反映出去。几天后,他将写成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交给雪峰,并一同拿去给鲁迅先生看。先生说,可以的。就这样,拿去发表了。因此引起了周扬等“国防文学”倡议者的围攻,开始了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

当时F听从雪峰的指示,不做任何答辩,一切由雪峰处理。但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发展到徐懋庸给鲁迅先生写了公开信,诬蔑F及其他朋友。迫不得已,先生抱病写信答复。在信中,先生提到了一年多以前四位文艺界负责同志(即所谓“四条汉子”)找他谈话的情况。关于那次会面,鲁迅先生从未向F提及过。先生对F是信任的,他看到了F的‘为人鲠直,易于招怨”。但从1934年穆木天的反正,并向左联告密到两个口号之争和这篇著名的答徐信,就成了F几十年或明或暗被攻击的渊源,直到1978年还有人在说胡风“挑拨离间”鲁迅和党的关系!

鲁迅去世后,F为了继承鲁迅精神和发场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除继续编译鲁迅著作外,又写了一些文艺述评,并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

“七七’事变前夕,我们得到家乡来电要我们回去。后来,F将我们母子留在乡下,只身回沪。“八一三”战事爆发后,F创办了《七月》周刊。出了三期后,他撤退到武汉,又继续出版,改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

在武汉,我们一家寄居在朋友家里。F一面要忙于‘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一面又要为自己的刊物看稿、回信、编辑、校

对等。另外，他还有个职业是对敌宣传工作。家中常有客人来访，弄得他坐下来写文章的时间都很少。后来，我将他这一两年的文稿编成了他的第二本论文集,即《密云期风习小纪》,并讽刺地说是“ 可怜的收获 ”。

我平时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务事，如登记来稿、寄刊物等。但第二年初春,我发觉自己又怀孕了。当时,下了决心要做人工流产。可是医生要钱太多,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加之我反应又特别厉害,常常忽然昏倒在地,因此只好不作流产了。这时,武汉的战事已越来越紧张，敌机频繁地来轰炸,F就让我带孩子先随朋友金宗武的家属到宜都去避难。到了初冬，他也从武汉撤退到了宜都。同时，他家乡的父兄子侄二十余口人也逃难到了宜都。

和一家二十余口住在一起，这在我们是从未有过的。这时,F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肩上负有多么沉重的担子。整个的‘ 家 ’由我管。听到老父的叹息,我不敢多花钱。但人多,每人又有每人的要求，结果我手头的几个钱都贴了进去。我不得不向 F 诉说了,他听了只能长叹一声“ 中国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几十年来养成的积习是无法改变的。农民离开了土地在外,是无法生活的。”

幸好不久,由老舍先生推荐,重庆复旦大学文学院长伍蠡甫打来了电报,请 F 去那里任教。虽然全家都不愿我们走，但我们解释说只有到了重庆才能挣到钱寄给他们。终于，我们一家三口在宜都住了三个月后，登上了到重庆的船只。

我怀着身孕，大孩子又只三四岁。我们艰难地走着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直走了一个月，才到达重庆。

把我们母子安排到市里一家小旅馆住下后，他就去离市区有百把里远的北碚黄桷镇报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但光靠这六

个钟头的课六七十元的薪金，是无法接济困在宜都的二十余口人的。因此，他接受了崔万秋的约请，在国际宣传处当特约日文译员，有一百来元的薪金，并说好只上半天班。

1939 年 1 月，我们还没找到合适的住处，就在小旅馆里生下了我的女儿。当时敌机正在轰炸，医生连手都没来得及洗就走了。F 守着我,我们相对地望着,听着远处炸雷似的轰炸声,心想,如果中了弹，就同归于尽吧！

到了 6 月份，我们才定居在黄桷镇的乡下。而 F 由于抗敌文协的工作和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仍得住在重庆，每周赶回乡下两次去复旦教课。那时重庆的交通十分不便，他不但十分辛苦，且须耽误不少时间，生命就这样赶呀赶地被赶掉了。

幸好他的身体还能支持。他不但要赶路，还要赶工作。除了上述工作外,《七月》又在重庆复刊了。选稿、编辑、跑印刷厂、校对等，这些都得他一人干，因我在乡下带着两个孩子无法帮助他。

到了女儿快两岁时，我们乡下的住处又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我们只好搬家到更远的山上去住。F 由于城里被轮番轰炸，没有去上班。崔万秋早就对他有所不满，这次就以此为理由，向他提出了警告。F 不得不辞去了国际宣传处的职业。

敌人想用轰炸来迫使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因此表现出特别地反动,对进步力量进行多种留难和迫害。教育部门扬言说，教授如不加入国民党，就不得聘用。复旦就有一位同乡对我说：“让胡风加入吧。那有什么嘛？入了就可以当专任教授，一百多元薪金，并且还是终身制！”我们没有为之动容。结果，到学期结束后就没有再给聘书。

F 完全失业了，只能靠很少一点稿费维持生活。物价飞涨，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买米都必须用高价买黑市。到最困难时，我只得用红薯掺点米煮粥度日。F到家看到这种情形，不由得落下了眼泪。幸好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周恩来同志将 F 安排到那里当专任委员。这样，不但解决了职业问题，更主要的是还能领到一份军米，我们才没有因失业而成了饿殍。

不久，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为了对此表示抗议，党安排一部分进步人士离开重庆，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香港。我实在过怕了这动乱不定、愁柴愁米的生活，希望能到延安去，将孩子送进保育院，自己参加工作，不再为家务子女操心，自由自在地工作。但是，周恩来同志决定让 F 去香港，并且一家人都去。这真使我失望。我想，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香港生活，困难一定是相当大的。在没有能找到工作时，还要增加党的负担。

1941年6月，我们到达香港。这里米珠薪桂，我们一家四口挤住在一间十一二平米的后楼内，光房钱就要三四十元。孩子们在重庆乡下跑惯了的，现在一下子拘束在这斗室中，实在受不了，小女儿吵得更凶。F不但不能工作，写文章换稿费，连平静的生活都不可得。生活费只得靠党给的补助，可是党也很困难呀。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我们商量后，就决定让我带孩子们回上海住到我母亲家，他在香港寄点钱给我们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

但是，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发现大孩子身体不好，有患肺结核的可能。为了将两个孩子隔离，我就把女孩送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托儿所去全托，自己又将大孩子带回香港，想在香港过冬，把孩子的身体养好，春天再回上海。

我想的都挺好，见面时两人更是高兴。我们十分愉快地过了

三天。可惜，炮火声将我的美梦震醒了。珍珠港事件后，很快，日本兵就在香港登陆了。 1942 年 1 月,我们再一次做了难民,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出香港，进入东江游击队区，辗转于 3 月初到达桂林。

到桂林不久，几个青年说筹有一点钱想办出版社出刊物或出丛书。F 认为钱不多,周转不动,便向他们提出出一套诗丛。这就是后来的南天出版社。F 为它编了一套《七月诗丛》,后来资金积累多了,又编了《七月文丛》,其中有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青春的祝福》。这些书的销路都很不错。只是出的书必须由图书审查机关通过,经常被删改,甚至被扣。

我们滞留在桂林，主要是等重庆南方局的指示，看是回重庆还是到别处去。到 7 月份时,重庆官方的宣慰使刘百闵来了,并且请客招待脱险的文化人。胡风、茅盾、沈志远都去了。席间，刘百闵发言表示希望大家不要成为问题中人，应该去重庆插一炷香，自己的意见不妨牺牲，云云。并且给他们每人留下五百元路费。周恩来同志传来话“只要不出卖灵魂,钱可以收。”他们这才收下了这笔钱。

我在桂林时，一次偶然兴起，向晓谷讲了一个小面人的故事。胡风和另外几个朋友听后都很感兴趣，鼓励我写出来。后来，我用诗体写出,经 F 修改,定名为《小面人求仙记》,投到当时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上发表了。可能由于是第一篇童话诗吧，很得文艺界朋友们的欣赏，很快就出了单行本。这是我在桂林一年来所做的一件使我高兴和满意的工作。

F在桂林同地下党和文艺青年关系很好，做了不少事，心情很愉快，并不急于去重庆。但是重庆官方不断派人来催促滞留在这

里的文化人回去。 12 月，茅盾夫妇回重庆了。我们终于于 1943 年 3 月离开了桂林去渝。

在重庆仍是不容易找到房子，只得搬进文协暂住。这时才知道《七月》的登记证由于一年多未出版已被书审处吊销，只得另行登记，并将自己的几本书送审。

他和周恩来同志约了一个时间,向他汇报了香港的生活,又谈到重新登记刊物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立即拿出 3万元法币做登记用的保证金。

我们到后的第三天,刘百闵即派代表来访,说是蒋委员长要接见文化人。后来才知道共有五人,有茅盾、沈志远、钱纳水和胡风，另一人就记不清了。接见是象征性的，问了一些普通的事情，几分钟后即退出。不久，张道藩的中宣部文化运动委员会聘请他和茅盾为特约撰稿员。经研究，他们都应聘了。F 只是做过几次讲演，并没有为他们的刊物写过稿。

到重庆不久,路翎引来了他新交的朋友方管(舒芜)。他看去是一个老于世故，能说会道的青年，比路翎大好几岁，现在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哲学和古文学方面的知识。F 一直对路翎很信任，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才华横溢、有远大前途的作者。现在，因舒芜是路翎的朋友,F 因此也就对舒芜有了好感。以后,他经常来信或来访,并寄来不少论文。F 都仔细地看了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也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重庆开始热了起来，并且又常有警报。我们决定搬到乡下赖家桥去定居。

安家住房的问题还好解决,何况我们的要求又不高,但是为了取得刊物的登记证可就太难了！刊物本来起名为《朝花》，结果被

用‘缓出’二字驳了回来。F 不甘心,又以《希望》为名提出申请。怎么会想到用‘希望’二字呢?一是由于对《朝花》的失望,希望这次能有《希望》,二是我们正在看希腊神话,说到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盒子,各种祸害都飞向世界,只留下了‘希望’和一个胆小的“幻想”还在里面。我们说,就让希望和幻想陪伴我们,让祸害都飞走吧!

在为《希望》奔波的同时,他送审的几本书经过多次交涉被通过了。但是南天出版社要在重庆开业却缺少资金,这也得 F 亲自去到处张罗,争取资助。

直到 1944 年 5 月底才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通知,批准《希望》可以送审出版了。

他重看了舒芜的《论主观》及《哲学与哲学家》。关于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F 过去编刊物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介绍这类文章。他读过一些马列主义方面的书,也对此很感兴趣,却从未专门写过这类文章。这次回重庆后发现文化界在这方面很热衷,有种探讨的新气象。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原》,主要就是文史哲方面的文章,还有,乔木(乔冠华)参与编辑的《群众》上也登有不少这类文章,如乔木的《方生方死之间》等。舒芜就给 F 看了不少这类文章,F 不但介绍他和乔木、陈家康等认识,还把他的稿子介绍给乔木,但是遭到了退稿。F 只觉得这青年有才气,书也读得多,至于理论方面是不是站得住脚,他就没把握了。他本着一向办刊物的主张‘向荒崖寻火种’,总希望能多培养出一些新作家来,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这样会使刊物和文化界都有生气。这个主观愿望能说是不对的吗?F 将《论主观》编进了《希望》第一期,并选木刻《麦哲伦通过海峡》作为封面。1944 年的最后一天,《希望》终于见

世面了。

11 月间,我忽发寒热,高烧不退。医生说是恶性疟疾,打了奎宁针才退了烧。幸好 F 这时正在乡下。我病着，他一面校对《希望》校样,一面还得做饭,只好请了一个本地农妇来帮忙。我虽然退了烧,但身体衰弱得不能下床,仍是躺着昏睡。文工会秘书从城里回来,告诉 F 日军准备进攻重庆，蒋介石不是投降就是往山区撤退。周恩来同志决定我们不能去延安的就留下去山里打游击，让有本省袍哥关系的人做好联络工作。我当时糊里糊涂地，一点也不知情。等我病好能下地时,F 才同我商量,我说“:我想日本人不会进攻重庆的。你赶快进城看看去吧。”

进城后得知，日军似乎没有再向前进攻，重庆依旧是歌舞升平。

第一期出版后不久，他参加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会上，茅盾、以群向《希望》进攻,主要是攻《论主观》和一篇小论文中提到的“客观主义”。F 做了解释。几天后又开了一次会，有侯外庐批评《论主观》。F 希望他们能写出来,在《希望》上发表,但他们又不愿见诸文字，只好随他们去了。事隔四五天后的一天夜晚，F 参加了 50 号召集的关于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认为有些作品是存在着“客观主义”,这种对现实的冷淡态度不好(大意如此)。问题就此暂时搁下不谈了。

虽然如此,F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办刊物的方针，没有在第二期上发表一些反对《希望》的名人的作品(这是出版者明确地提出过要发表的)。结果,第二期还未出,出版社就提出毁约,这样他就更为反感,登出了本不准备用的舒芜的《论中庸》。第三期后出版社就不肯出了。尽管《希望》的销路比别的刊物强,但就因为一篇《

主观》招致了某些名人的不满,而受到这样的冷遇,以至无法生存!

有一个河南读者主动给 F 来信,说有一笔钱愿意投资出《希望》。F 去访问了他,原来是一个青年,家里给了几万元让他读书,他觉得应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自己可以去工厂做工。F 觉得仅靠这一笔钱出刊物是不行的,还不如投资搞出版社。将来出版社赚了钱再出刊物。于是,F 决定将南天出版社改组成希望社,先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并且向熟人募股。我们和有钱人没有什么交往,所以募股还得在文化人中进行。一些影剧界的朋友都热心地出了股款,虽然只是一股半股地,但给了我们不少的精神支持。F 才从出版社拒绝出版《希望》的不快中摆脱出来,一心一意地搞希望社。

正在募股时,8 月 10 日夜,重庆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山城沸腾起来了,在这里度过八年抗战日子的下江人尤其兴高采烈,纷纷做着返乡的准备。

F 和我商量先搬到重庆去住,因为在这之前,国民党已将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我们在此没有工作驻点,生活诸多不便。这两年冬天雾上来时,我常进城去看话剧、电影等,也拜会了一些朋友,对重庆的生活比较熟了。有时还参加文协的晚会和职业妇女座谈会。我很想多写点东西,但只写了几篇小说,一篇《中元夜》发表在雪峰编的《抗战文艺》上。文协秘书梅林介绍我加入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会员。因此我立即同意了 F 的建议。

毛主席到重庆来参加和平谈判了。 9 月 4 日,F 赶进城,当天晚上到 50 号,与许多人一起到红岩参加欢迎毛主席的舞会。徐冰同志领他和雪峰一道去见了主席,正谈着话,一位从延安出来的女记者拉主席去跳舞,谈话中断了。后来又见面谈了几句,时间都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短,他还参加了张治中欢送毛主席的宴会,不久又赴九龙坡机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但这两次都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 F 为此一直感到遗憾。

胡乔木同志留了下来，他亲自来找 F 谈话，后来又约舒芜做了一次长谈。最后，由于舒芜坚决希望胡风陪他去访胡乔木同志再谈哲学问题。如果是聪明人，他就应该抽身而退，由他们谈去。可是他却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听着,虽然一言未发,但那二位争辩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这对 F 是多么不利啊！

我们进城后借住在文协。这时,来访的人很多,他也常去看朋友，并为复员回上海事做准备。

F 编好《希望》第四期后,就交给希望社出。只薄薄的一本,很快就出来了。同时我们还将纸型托人带到上海请海燕书店的俞鸿模在上海重印发行。

我们终于买到飞机票，收拾行装要回上海了。临行前两天学生游行,反动派的暴徒以此为借口砸了《新华日报》门市部,打伤四人,F 赶到市民医院去慰问。当晚，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请吃晚饭为我们送行。记得他曾说，今天反动派的阴谋诡计是吓不倒我们的,我们准备奉陪到底 听到周恩来同志理直气壮的话,我们心里很激动,联想到我们将回到的上海也不会平静,一定要有与反动派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1946 年 2 月 25 日晨 7 时从重庆起飞,在南京停了一会,下午一时到龙华机场,到家中已快 3 时了。我见到了衰老多了的老母亲，她高兴得哭了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年的日子在她是多么地难熬。

当夜我们就去看了许广平先生，从她那里知道一些上海的近

况和留在上海的朋友们的情况。 F 开始去看望从重庆先后来沪的作家们，商量在上海组织文协。一周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女青年会托儿所接女儿。那位胖所长，大约看到我们不像接收大员，就很不客气地说“：晓风在这里,你们都不管,有时不寄钱来。”随手就将一本募捐簿给了我们，“给我们募点捐吧！”看着她那股傲气劲儿，F 只好接下了捐簿，很客气地与她告辞，而她对在这里住了三四年的孩子没有说一句话。孩子也没说一句话，就跟我们走了。

已经七岁的孩子长得又瘦又矮，我们看了几乎落下了眼泪。后来，我们为了使她那颗受伤的心温暖过来，花了不少的力气。

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房子。我们原来的住房被房客占了，只给我们留下一间，还有老母亲与我们四口同住。F 只得托人交涉请房客退房。当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是‘ 五子登科 ”,不但有大房子，还有金子、车子等。可我们为了这几间房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花了一笔钱才将房客‘ 送 ’走,解决了住处。在这之前,F 什么事也无法做，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写的文章不多。不过,总算把希望社重建了起来,同时,《希望》也由中国文化投资公司继续出版了。随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日益猖獗，《希望》在出了四期后，终于被停刊，那公司的经理由于协助地下党被发现，只得潜逃,公司被查封。

希望社除将有纸型的书重新印行外，又出版了《财主的儿女们》全部上下二册。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纸币不断贬值，收回的钱无法再生产。我们为节约开支，不敢另外请人帮忙。一应杂务，如会计、邮寄、跑印刷厂等工作就都由我一人无偿地包了。但是，我在 1947年秋天又生了一个男孩,因此,我不但帮不上忙,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同时,国民党倒行逆施,上海布满了特务,军统、中

到处抓人。F是进步文化人，又常去各大学和一些民间团体讲演，在《希望》上发表的一些进步的鼓舞青年的诗歌常被文艺团体在开会时朗诵，很得青年人的喜爱。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开的黑名单上有了胡风的名字。他那段时间内没敢在家住，只在朋友处寄宿。

在这之前,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发了几篇文章,主要是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虽然写文章的人多半是 F 的老朋友,作为他的诤友,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这里面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使 F 难以接受。他为了对读者对文艺事业负责，不愿像对一般人一般问题那样客客气气地说几句漂亮话(即所谓‘虚心接受,不了了之”),而是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本来已准备全部刊出的，后因有人反对而不用了。最后，连刊物都停办了。这时,国共两党再一次分裂,上海思南路办事处撤退,所有党员都转入地下，地下党派人通知 F,要他去香港。他就于 1948 年 12 月 9 日离开我们,秘密奔赴香港,继而又转到东北解放区。

我留在上海将希望社继续办下去。我把《论现实主义的路》纸型买了过来,出版了,又再版了吕荧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同时还协助几个青年编印地下文艺刊物《蚂蚁小集》。直到上海解放,希望社不但没有全部赔光,将存书批给新华书店后,每位作者补发了 20% 的版税。此外,还节余了 3 万余元，就连同纸型等一起转给了新文艺出版社。那 3 万元用‘钟洪’的名字作为投资,算是我们还的周恩来同志的贷款。

我带着三个孩子和老母在上海度过了艰难的一段生活。而参加编《蚂蚁小集》的两位同志后来又被捕了，我的处境十分危险。

当时大家都岌岌可危,能走的走了,没走的也隐蔽起来了。而物价一日三变,好容易找到的一点法币(国民党发的纸币),还没来得及去买米，就贬值了一半。要维持五口之家一日三餐，可真不易啊！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很快，我就收到了 F 从北京托人带给我的信，信中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同样地，我也十分高兴，积极地参加了上海文艺界的游行，还和几个青年一起出版了文艺刊物《起点》。《起点》的封面就是我大胆设计的。在这上面,第一次发表了 F 的诗《小草对阳光这样说》，我知道这是他对党真情的流露。我又一次拿起了笔,写了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

第一次文代会后，他回到上海，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他都没有和我细说，他不愿我为他烦恼。9月份，他被邀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会后,他留在北京,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歌颂党，歌颂新中国。我的《小红帽脱险记》经他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连载，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之后,F 就常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参加了全国英模大会,又曾到四川巴县参加土改。

我在上海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文艺小组。由于小儿子太小，不能正式工作，只能尽量参加各项活动。除了常去听报告外，还参加了短期的土改、五反以及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还出席了上海的第一次文代会。这时，我又写了童话诗《小青蛙苦斗记》，发表在《文汇报》上。

在全国文艺界整思想时，F 写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学习,为了实践》,但领导上决定不用,而要他到北京去讨论问题。这时,《长江日报》上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转载了,并在编者按中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9

月,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文艺报》编者按指出,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舒芜在这里企图嫁祸于人,而路翎的答信又登不出来,造成了路翎的困难处境。虽然后来登了,但人们已为舒芜的文字所惑。后来,林默涵和何其芳都发表了长篇专论批评F,但并不能使F口服心服。有人传达周总理指示,要胡风先参加工作,也可以到朝鲜去。F同意先参加工作。他后来和我说"我想先把你们的生活安排好,一去朝鲜就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不久,他参加了去东北慰问志愿军被俘人员的代表团。回到北京后,买下了地安门内的几间破房,并马上着手修理,准备全家迁居北京。他给我来信说:"生活上一直都是由你操心,这次我一定要为你尽力,为你们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我们于1953年8月搬到北京。F这时的具体工作是《人民文学》的编委,而我的工作还没定下来,也无法写些什么,原因是家中的客人较多,我得忙于家务。

1954年,路翎从朝鲜回来,写了小说《初雪》,后又写了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但不久就受到了《文艺报》、《解放军报》及一些文艺界人士的批评。有人告诉我们,周扬说了,路翎的小说越有读者,我们就越要批,因为它是体现了胡风的理论的。再加上一些和胡风接近的作家都受到压制,无处发表作品。这些情况都促使F计划写《三十万言书》。

他的这一想法和一些过分直率和大胆的言行,我是不大同意的。所以一开始我不愿帮他抄这报告,我一再劝他,鸡蛋不可和石头相碰,万一砸下来,可不止脚痛啊!我想到鲁迅先生文章中所提

到的各朝文字狱，和我从别的书上看到的这类情况，实在为这一家老少担心。但他却说，这是向党交一份报告，现在不是封建帝王时代了，应该相信党，即使提错了也不过再挨顿批评，思想搞通了就深刻检讨嘛，不必害怕的。于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他抄了。

报告书呈上去后，恰逢批评“红楼梦问题”。周扬和别的人都来动员 F 发言，于是他又毫无顾忌地发了言。造成轰动也造成了混乱，转过来他倒成了被批判的主角。

批判文章一浪高过一浪，时间之久，上纲上线之严重，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虽然 F 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不仅得不到认可,反发表了舒芜摘录的 F 给他的私信和他所加的注释。从此，开了往后交私信查日记的先例。而这些信件，经过有才气的舒芜这么一摘,那么一按,就成了胡风反党的罪证,而他立了一大功！

三天后,1955 年 5 月 17 日的凌晨,我与 F 在家中同被公安部门拘捕。我最大的罪名是抄写《三十万言书》。

直到 1961 年 1 月我老母病死在医院，公安部门才让我走出监禁处，去医院收尸火化。后来也就没有再收监，我算恢复自由了。监禁时间近 70 个月,付伙食费 1400 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